

查办“九·七”大案纪实

达群 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查办“九·七”大案纪实/达群著.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6. 1

ISBN 7-80107-074-7

I. 查… II. 达…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4303 号

查办“九·七”大案纪实

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大觉胡同 50 号 邮编: 100813)

北京凯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25 字数: 117 千字

1996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1—10000 册 定价: 7.80 元

中国方正出版社

引子*

也许，历史将证明：1993年8月21日是中国又一页恢弘的篇章。

这一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议大厅，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二次全会按照会议议程召开了又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和廉政建设。表面上看去，不过是一次中央纪委的例会，平平常常。

惩治腐败已经进行了不止一年。对于腐败现象，我们的报纸、杂志也已作过虽不深透，却也是多方位、多侧面的披露。群众有切肤之痛，这几年，以“黑脸包公”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层出不穷。堪称收视率世界之最佳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最多一次竟同时登台了八位“包公”，共唱一段“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

这反映了发自群众心底的呼唤。

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确有些不平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七位领导同志全体出席了会议。人大、政协的领导和在京的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的

* 出于读者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对涉及的部分单位和人员使用了化名。

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中央军委、三总部和武警总部的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6百余人，济济一堂。

在北京的主会场外，除了台湾省，全国三十个省、市、区还各设了分会场，用微波通讯网络转播主会场的情况。各省、市、区的省委常委和有关领导同志全体出席。

这样的规模，在中央纪委的历次全会上，是第一次。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我们不能低估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反腐败斗争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进一步抓紧抓好，务必在近期内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

在正式报告结束、连通全国各省、市、区分会场的电视转播关闭之后，江泽民同志又向在场的中央纪委委员和中央、国家机关列席会议的同志作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即席讲话。他用大量的事实，历数了党内滋生蔓延的种种消极腐败现象；广引博证，说明了腐败问题对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严重危害，殷切希望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中央纪委和监察部的数个调查组已经分赴各地，着手查处一批大案要案。

其中，第九纪检监察室的一个调查组在贵州省会贵阳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繁忙、紧张的调查工作。

目 录

(99) 向商必入
(101) 客取星天
(101) 吕公叔群
(2) 引 子 (1)

上 篇

运筹帷幄 (1)
第一回合 (5)
鏖战丽晶 (12)
顺藤摸瓜 (19)
书记出征 (25)
紧急出动 (34)
帐海捞针 (40)
快速突击 (46)
法律之剑 (58)
扩大战果 (66)
二下春城 (72)
千里追捕 (79)
血沃杜鹃 (90)

下 篇

人心所向	(99)
残星殒落	(103)
特殊公民	(110)
管天管地	(115)
欲海漂沦	(122)
权钱交易	(131)
变态灵魂	(136)
夫人背后	(140)
尾 声	(145)

附 录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察部关于 闫健宏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的通报	(153)
从闫健宏、郭政民案中我们看到了什么	(158)

上 篇

运筹帷幄

事情要从头说起。

1993年5月。

一辆机要交通车驶出中南海，向北，然后急转向西，一直驶进位于北京城西北角的一座不起眼的院门。

院门虽然没有显赫的威严，但是却设着两道岗。哨兵的军装上也没有那种红、黄两色的镶边。明眼人知道，他们是中央警卫团的士兵。大院的周围是一道六米高的用灰砖砌就的围墙，院内矗立着一座十二层大楼。

这就是中央纪委机关所在地。

一份已经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同志批示过的《要信摘报》，在副书记侯宗宾等常委们中传阅着。

这是中央纪委信访室编印的、群众来信反映贵州省政协常委、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闫健宏以权谋私等问题的机密件。

中央纪委实行常委集体领导负责制。自从党的十四大以来，这一届中央纪委常委就一直在研究如何把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决策贯彻下去，落到实处。近几年来，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在一些地区、一些部门蔓延，已经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遏制，势将危及政治、社会的稳定，危及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不严肃地揭露和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就不能惩戒腐败，不能教育全党，不能取信于民，不能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在1993年初部署各级纪委和监察机关合署办公的工作会议上，尉健行同志就明确提出，要以查办案件作为反腐败斗争的突破口，以此来推动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等各项工作的开展。

常委们都勤奋地工作着。他们的这个“官衔”，按老话可以称为监察御使、或是副都御使，自古以来就是个费力伤神又得罪人的差事。但是，反对腐败关切政治大局，虽然我们党自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以后，就成立过反对贪污腐化的机构；虽然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就亲自批准处决了腐化堕落为贪污罪犯的刘青山、张子善，但是要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把反腐败斗争摆到相当重要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并加以实施，还是一个难度极大的问题。他们作为党的最高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干部，明知其任重而不惜身，始终为“分察百僚，巡按郡县”，惩治腐败，精力旺盛地工作着，没有丝毫的懈怠。

为了更切实地掌握消极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严重程度和危害，他们不辞辛劳，上工厂，下农村，到各地进行了大量

的调查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深知，作为一个高层领导听取的汇报，看到的情况，难免有下级虚报浮夸的成分，另外要求各个纪检监察室组织了若干个调查小组，直接到最基层的群众中去，掌握第一手材料。还特别强调，调查小组在必要时可以不向当地领导通报，不要有关人员陪同，直接进村串户，和老百姓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屋。回京汇报，只讲亲耳所闻、亲眼所见，沥去所有的“水份”。

根据常委的要求，各个纪检监察室深入调查研究，直接了解和掌握了许多情况：

华东某地为了应付上级绿化委员会的检查，责令当地百姓沿“国道”挖坑，又从别处砍来长满绿叶的树枝，连夜栽上。一夜之间，原本没有一棵绿树的国道两旁，杨柳摇曳。第二天，载着“绿委”的车队风驰电掣般驶过，领导在车上不断赞扬当地官员“搞得不错”。车队一过，那些无根的树枝都枯萎、干巴了。老百姓们又不得不奉命把枯枝拔去。群众编了个顺口溜：“领导一日好风光，百姓劳民又伤财……”

在西南某县，县领导向上级汇报他们已经带领群众步入了“小康”。上级领导不信，要深入群众去实际考察。他们竟花费数万元布置了两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领导看过，信了。事后，两户农民却和乡里、村里打起架来。布置农户是村领导办的，钱是乡里出的，他们要把东西拉走。农民不干，说你们欺骗上级领导，有“欺君之罪”，把东西拉走，我就去告你们。乡领导、村领导害怕了，只好私下与农民谈判。结果是，拉去的家具、电器以半价卖给两户农民；农民呢，也不再上告。

调查小组还到过南方一个地区。地区机关在盖崭新的办

公大楼，县委、县政府在忙于将领导乘坐的国产轿车换成进口轿车，而他们走到的三个村寨、十几户农家，家家只有几斤玉米渣，顿顿都搅着野菜喝糊糊。那个地方气候温暖、湿润，几乎什么作物都可以生长。按这三个寨子的脱贫计划，只要二、三十万元启动资金，五年之内就可以解决“温饱”。这个数额，是任何一位领导把自己屁股底下的座车换成吉普车就可以拿出来的。

纪检、监察干部的眼里是揉不得沙子的。对信访室反映闫健宏问题的《要信摘报》，常委们的意见非常明确：由第九纪检监察室立即组织核查。

中央纪委的二级机构之所以称室，那是另有原因的。据说在机构设置之初，中央考虑中央纪委不同于其他机关，为了使它的二级机构明显区别于各部、委的厅、局，选择了室的称谓。

九室负责联系西南、西北地区的九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贵州在九室的联系范围之内。

九室主任姓孙名国芝。他根据常委的批示，和几位领导经过慎重、仔细地研究，确定由副主任汪开国带队、鲍成和房永斌参加，组成调查组，赴贵州进行核查，并详细研究拟定了初查方案。

1993年7月30日，九室调查组登机直飞贵阳。

一件涉及正厅级领导干部的重大经济犯罪案件拉开了序幕。

第一回合

“波音 737”昂起机头呼啸着爬升到了万米高空。

这几年，西南航空公司有了很大的发展，原来差不多只有前苏联的“图 154”型班机，现在也装备了“波音 737”。机舱整洁、憩静，看着舒服，坐着也舒服。但是，坐在座舱中部的老汪、鲍成和小房谁也静不下神来休息。尤其是老汪，他反复思考着到贵州以后会遇到什么情况、该怎样行动？虽说早有了计划，但那毕竟还是纸上谈兵，下水才知深浅，入口才知咸淡，现在这一切还都是未知数。

在赴贵州前，他们按照既定的工作程序，于 7 月 26 日下午，与闫健宏的丈夫谈了话。

闫的丈夫原来是贵州省委书记，此时已经调离贵州。他中等个、胖胖的，看上去很富态、很和善、也很有领导风度。他老家是河南新郑，虽然曾在北京工作过很长时间，但说起话来仍然乡音不改。老汪和九室的许多同志过去都曾见过他，但那时是为了检查、了解贵州省的有关情况和过问一些个别事项。而这一回，则是对涉及他夫人的问题进行的第一次直接调查。

这次谈话的结果是不令人满意的。开始，他还十分客气地表示，他完全赞成中央纪委对群众反映闫健宏的有关问题进行核实了解，说：“党的干部要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嘛！谁有问题都要查，不光是闫健宏，就是涉及到我的问题，也欢迎组织调查。我们相信组织上是会实事求是的。”

但是一问及与群众反映的问题有关的几件事，他的态度就似乎有了些微妙的变化，不是说你们不了解情况，就是说根本没这回事。他还多次有意无意地提及，在贵州，闫健宏领导的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效益最好的企业，他个人是省委领导班子中最廉洁的干部。说到后来，他看几位同志没有吭声，越发慷慨激昂：“我看你们去贵州了解，无非是告诉别人中央纪委来查我省委书记了。我的问题不是这些，而是有人在换届中落选，嘴上不说，心里不平衡。他们对我说不出什么，就把我的老婆、孩子当成了集中攻击的对象。他们有的人不廉洁，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说到最后，他干脆话锋一转，向调查组提了个“不坏”的建议：“我已经离开贵州，要是单纯了解这些事，我可以叫闫健宏来北京，由你们直接向她了解就可以了。当然，是不是去，请你们考虑”。

此时，调查组还不可能对闫健宏丈夫态度的好坏和谈话的虚实作个什么评价。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接受闫健宏丈夫的建议。尽管他一再解释，他的这个意见完全是出自对党的工作负责和避免造成“八分邮票，白跑半年”的考虑。

调查组下榻在地处贵阳市南明堂的省委招待所。

南明堂是因河而名。这里背山面河，乌江的支流南明河从窗前缓缓淌过，由西北流向东南，又转向东北，把一片山、两面坡围成一个半岛。贵州省委招待所就座落在半岛之中。竹林掩映，山青水碧，风景如画。由于地处高原，虽临酷暑却气候宜人，丝毫没有盛夏之感。然而，调查组的三名同志却没有观山赏景的心情，摆在他们眼前的将是一场艰巨的战斗。

调查组刚在招待所落脚，闫健宏又通过省纪委传过话来：

“我7号要出差，如果调查涉及到我的事，最好先找我谈谈。”

显然，她早就知道了消息，先入为主。

调查对象主动要谈，一般有两种情况：没有问题的，想向组织表明态度；有问题的，想探听口风。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掌握当事人的思想动态都是有益的，调查组欣然答应了下来，但决定只带耳朵不带嘴，先听闫健宏一个人的。

8月6日上午8点半，闫健宏准时来到了省委招待所302房间。

“中纪委的同志住在哪儿？是不是这间？行了，你们下去等我。”调查组三名同志还没见到她的人影，就听走廊上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和一口带着河南腔的讲话声。无疑，是闫健宏来了，而且她还带了随从。

她没有敲门，一推门就进来了：“啊，欢迎，欢迎！怎么搞的，安排你们住到这里？条件太差了，也不方便工作，应该住到花溪去嘛！老刘调到北京去了，方仁同志也真是。到贵州这个穷地方来，委屈你们了。你是开国同志吧？这位是……”

一阵寒暄介绍之后，大家算是认识了。可调查组的同志总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闫健宏中等个，脸圆圆胖胖的。她1933年生人，比丈夫小三岁，参加工作却又比丈夫早几个月，算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她保养得不错，六十岁的年纪，看上去却只有五十来岁。说话冲，底气很足。

她有备而来，滔滔不绝整整一上午，从16岁参加工作，一直讲到眼下。她说自己和丈夫俩人为了贵州的繁荣，饭吃不好，觉睡不香，家顾不上，从来没有为别人批过一个条子，

也从来没有安排过一个亲属。

当问及她的太儿子刘博的情况时，她说他别的什么问题也没有，如果说有问题，那就是与前妻不和，离了婚又找了个年轻的。

说到最后，她还显出一脸委屈：“十年动乱，我和丈夫为了保护老同志，挨过批斗。我们咬牙硬撑着，就是不低头，那么难也没有掉一滴眼泪，终于挺过来了。可这一次，我真有点受不住了。现在有人别有用心，到处造我的谣，整我，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搞的，是贵州的第二次‘文革’。我可以用党籍保证自己没有任何问题。你们要是查出我有问题，什么处分我都接受，也可以株连我丈夫。但是如果没有，希望组织上给我正名……”

多么恳切，多么清楚，又是多么清白。看她的样子，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现今的事，有的时候就那么奇怪。尽管闫健宏和他的丈夫，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贵州，但他们不约而同，都说调查他们的问题是因为有人要“整”他们。这种情况和调查组在其他案件中遇到的几乎一样。明明是群众反映被调查人的违纪违法问题，却常常被说成是别人要“整”他。也许是过去不正常的政治运动搞得多了，也确有不少被“扩大化”整了的，似乎一讲自己挨整，就可以博得同情，洗清自己身上的污点。

当然，和对待闫健宏丈夫自我表白的态度一样，调查组不会、也没有轻信闫健宏用党籍为自己打的保票，因为查办案件是以事实为依据的。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讲，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

群众来信一共举报了闫健宏 7 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线索比较清楚、比较具体的是她在 1993 年春节用公款大肆送礼和利用职权为儿子在中外合资企业丽晶公司游乐服务有限公司占有股份的问题。调查组根据群众的举报和调查局面尚未打开的实际情况，决定先同时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核查，视情况再对闫健宏的其他问题渐次展开，最后再将涉及她丈夫的问题搞清。

事后总结，这是个成功的经验。

贵州省委和省纪委对调查组的工作非常重视，给予了大力支持，选派了老谭、老徐和刘培信等三名室主任参加该案的调查。还有几名同志随时等待通知，配合工作。

调查组分析，闫健宏送礼金大多是会给省上的领导和她的“关系户”，遂决定由老汪直接负责调查。

老汪先后找了省里的一些领导谈话。他们中除个别同志可能是因为碍于闫健宏和她丈夫的面子，没有坦率地讲清问题以外，大多数人还是讲原则、讲党性的，其中一位省领导同志还主动提供了闫健宏在春节前派人送给他的 5 张 100 元面额的“礼仪储蓄存单”。陆续地，又有几名领导也交来了同样的存单。

接着，老汪又派人到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调查，进一步掌握了闫健宏购买和赠送这批“礼仪储蓄存单”问题的来龙去脉。

1992 年，闫健宏在担任了贵信公司董事长之后，曾几次在她经常去的一个招待所宴请“贵信”各个股东单位的领导。宴席上，她喜形于色，多次说：“以后，你们想吃点什么了、有什么客人要招待了，就到这儿来。由我买单，负责‘三

包’。”

当时，有人提出到这儿不方便。闫健宏嘿嘿一笑，说：“看样子，你们是各有地方啊！那好办，到时候我给你们各位一笔钱。你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她没有食言。就在1993年春节，她指使手下人写了一个“送礼”的报告，详细开列了要赠送的单位和个人的名单，然后大模大样地在报告上批示：“同意按此方案办理”，两次用公款到银行购买了8万元“礼仪储蓄存单”。其中有4万元，她亲自送给了4个入股“贵信”的单位的领导。其他的，由公司人员按照她确定的500元、300元和200元三个档次，分送给33位省、厅级领导干部和一些“用得着的”处以下干部。

由于闫健宏的特殊背景，此举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一些单位纷纷效仿。一时间，在贵州这个偏僻的内陆省份形成了没有红包不开会，不送礼券不过年的坏风气。

闫健宏和贵信公司确实存在经济违纪问题。调查组与贵州省委有关领导研究后，报经中央纪委领导批准，商请贵州省审计局派出审计组封存贵信公司帐目、进行全面审计，省人民银行稽核组对贵信公司进行信贷稽核。

同时，由老汪再次找闫健宏谈话。

这一次，闫健宏没再“关心”和“过问”调查组的吃、住情况。她进屋刚刚坐下，就直着脖子问：“我们‘贵信’有什么问题？你们凭什么要审计？现在搞得我们公司乱糟糟的，影响了安定团结，影响了企业效益，这不符合中央精神。出了问题，到时候可要你们负责。”

老汪瞅了一眼闫健宏，虽说他经手调查过不少案子，也与许多省、厅级干部谈过话，但像闫健宏这样的还是第一次